

doi: 10.16169/j.issn.1008-293x.s.2019.02.011

盛唐集贤学士的应制诗研究

李芸华

(厦门大学 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唐开元中期崇儒重文,以张说为中心的集贤学士地位崇高,应制唱和活动十分频繁。集贤学士的应制诗延续了初唐宫廷诗的“三部曲”结构,但在诗境的构造上别开生面,文治武功、道教神仙等意象大量出现,这既是时代风气在文学上的投射,反过来也促进了盛唐风貌在社会中的传扬。学士中风韵不同的两代人在继承中谋新变,他们的创作不仅为应制诗带来一股刚健、灵动的新鲜风气,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律诗的发育。

关键词:集贤学士;应制诗“三部曲”结构;新变

中图分类号:I22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3X(2019)02-0066-07

收稿日期:2018-11-20

作者简介:李芸华(1991—),女,陕西榆林人,厦门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汉唐文学。

集贤学士是唐玄宗崇儒重教的产物,本非为振兴文学而设。开元前期,玄宗偶发诗兴,颁群臣游幸赋诗,当时只有苏颋、贺知章、张九龄等台阁文人唱和助兴,应制规模小,次数少,景况萧索。开元十年(722),张说入主丽正院(开元十三年改为集贤院),以文儒兼长或专精文学之士重组学士队伍,并大力提高他们的地位,集贤学士逐渐成为盛唐文人极为看重的文化身份。此后,在玄宗和张说的措意下,集贤学士的文学活动十分频繁,应制唱和蔚然成风。

一、集贤学士的宫廷应制

开元十年闰五月,兵部尚书兼朔方军节度使张说往朔方巡边,玄宗御制诗送行,张说有应制诗,源乾曜、徐坚、贺知章、王翰等20人和作,皆为五言二十句排律,贾曾奉敕作序。开元以来,如此大规模的宫廷诗会还是第一次出现,这既是国威日臻的时代风气使然,也是张说个人的地位、才望所致。

开元十一年(723)夏,玄宗频赐丽正院酒饌,学士们宴饮为乐,前后赋诗凡数百首,由赵冬曦、张九龄、咸廑业、韦述等作诗序,编成卷轴以献上,丽正院的唱和拉开了序幕。其后,玄宗赐赞褒美张说、徐坚、贺知章、赵冬曦、韦述、吕向、孙季良等,敕善写真人为诸学士画像,足见嘉赏。同年左右,丽正学士于梁王宅内宴游,奉敕赋诗,唱和之风日炽。开元十二年(724)冬,玄宗东幸,诸学士随之东迁,又有诗作。

开元十三年(725),宫廷唱和因集贤院的成立而达于鼎盛。三月二十七日,玄宗于东都集仙殿赐丽正学士宴,并口诏改集仙殿为集贤殿。玄宗御制诗序,宰臣源乾曜、张说,学士徐坚、贺知章、康子元、赵冬曦、侯行果、敬会真、赵玄默、韦述、李子钊、陆去泰、吕向、咸廑业、毋斐、余钦、孙季良、冯朝隐等赋诗。四月五日,玄宗诏改集仙殿为集贤殿,以张说充集贤院知院事,徐坚为副知院事,贺知章、陆坚等18人为集贤学士。张说赴集贤院上任,玄宗赐宴,源乾曜、苏颋、萧嵩、贺

知章、陆坚、王翰、赵冬曦、韦述等重臣、学士应制赋诗,张九龄奉命作序。

开元十八年(730)张说去世以后,集贤学士的群体应制活动大为减少,天宝三年(744)钱别贺知章是他们参与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诗会。先是贺知章因年老上表请度为道士,求归越,玄宗诏许之。正月五日,百官于长乐坡饯行,玄宗御制诗序叙别,群臣、集贤学士等32人应制奉和。此次应制之作大多是五言律诗,个别为五言十二句排律。此后,集贤学士的文学活动盛况不再。

集贤学士的宫廷创作虽不及武后、中宗朝持久,也远未达到左右士林风气的程度,但是,他们的出现毕竟给青黄不接的开元文坛带来了一股活力,其成长壮大使京城文坛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并巩固了它作为文学中心^①的地位。

二、应制诗的艺术特点

帝王的志趣爱好及审美标准规定了应制诗的题材、体裁、基调及读者群,应制诗的写作因之比其他诗歌更为严格,约束也更大。诗人们必须遵守各种标准和法则,他们局限在朝臣的角色中,歌功颂德成为强制性的创作惯例,诗人独有的个性难免会因此而丧失。但是换个角度来看,应制诗可以帮助后人了解帝王朝士的文学活动,了解文坛主流的艺术趣尚,尽管它粉饰太平、格局狭小、踵事增华,但不可否认应制诗是一时风气的反映。集贤学士出现在治世崇儒的时代背景下,修撰图书、制礼作乐的职责使他们的应制诗多文治教化和太平气象,题材集中于宴会、送行,体裁则以五言排律为主。学士们从具体的场景出发,通过渲染气氛、张扬气势,书写文治武功、帝王威严和自己幸逢盛世的感受。

(一)“三部曲”结构

宇文所安先生曾将初唐宫廷诗的结构归纳为“首先是开头部分,通常是两句诗介绍事件。接着是可延伸的中间部分,由描写对偶句组成。最后部分是诗歌的‘旨意’,或是个人愿望、感情的插入,或者巧妙的主意,或是某种使前面的描写顿生光辉的结论。”^{[1]183-184}这种先点明主题,

其次接以描写式的展开,最后以情感反映作结的“三部曲”结构,同样是盛唐集贤学士应制诗最为直接的参鉴。

开元十三年集贤院定名之日,玄宗赐宴集贤学士,御制《集贤书院成送张说上集贤学士赐宴得珍字》诗,从题材、体裁等方面,规定了此次应制诗的写作范式,诗云:

广学开书殿,崇儒引席珍。集贤招
衮职,论道命台臣。礼乐沿今古,文章革
旧新。献酬樽俎列,宾主位班陈。节变
云初夏,时移气尚春。所希光史策,千载
仰兹晨。^{[2]35}

徐坚和作五言排律《奉和圣制送张说赴集贤院学士赐宴赋得虚字》:

崇文德化洽,新殿集贤初。庸菲参
嘉选,首滥承明庐。殊私光辅弼,荣送列
簪裾。座引中厨饌,杯锡上尊余。翠叶
浓丹苑,晴空卷碧虚。忝同文史地,愿草
登封书。^{[2]1111}

玄宗直入主题,首联即声明“广学”“崇儒”“开书殿”,为此次唱和定下基调。徐坚遂以“崇文”“集贤”“新殿初”相对,两首诗的前四句都点出在朝廷广学崇儒的文化政策下,群英荟萃的集贤院成立了,而张说正是实至名归的第一届领导人。接下来的三组描写对偶句包含两个层次的内容:首先是称扬张说,玄宗强调他在治礼作乐和变革文章方面的功绩,徐坚则突出其崇高的政治地位和荣誉;其次,用措辞典雅、对仗精工的语言描摹宴会的情状和时节、景色,这部分要求更为复杂的对偶、严格的声律和细致的笔触,最考验写作技巧。最后两句,玄宗以集贤学士可光耀史策、千

① 开元十三年前后,集贤学士作为宫廷文人的一部分参与诗文活动,逐渐主导当时文坛。他们上与帝王显贵游宴雅集,下与京师才俊往还酬唱,成为京城文学的中心。参见胡旭、李芸华《盛唐集贤学士之文学地位与影响》,《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110-118页。

载留名作结,使前面的描写顿生光辉,徐坚则流露出同列学士之位的自豪感和草拟登封书的强烈愿望。又如徐坚《奉和圣制送张说巡边》:

至德抚遐荒,神兵赴朔方。帝思元帅重,爰择股肱良。累相承安世,深筹协子房。寄崇专斧钺,礼备设坛场。鼙鼓喧雷电,戈剑凛风霜。四骝将戒道,十乘启先行。圣锡加恒数,天文耀宠光。出郊开帐饮,寅饩盛离章。雨濯默林润,风清麦野凉。燕山应勒颂,麟阁伫名扬。^{[2]1111-1112}

同样,前四句介绍张说巡边之事,中间14句由对偶句组成,第五、六句以张安世、张良来称许张说的文韬武略,同时也对应其大将军和帝王师的双重身份。第七至十四句以流畅俊爽的诗句书写送行的排场、气势,风格宏大壮阔,歌颂当朝文治武功的意图溢于言表。接下来叙述饯别时的饮酒赋诗,习惯性地附以一联意象清新的景色描写。结语再次用典,对张说得胜归来寄予厚望,奋发昂扬的意绪贯通全篇。

集贤学士五言律诗的写作结构也是“三部曲”的,如徐安贞《书殿赐宴应制》:

校文常近日,赐宴忽升天。酒正传杯至,囊人捧案前。玉阶鸣溜水,清阁引归烟。共惜芸香墓,春风几万年。^{[2]1227}

首联以“赐宴”点明事件,“校文”“升天”二句,值得细细品味。正因在集贤院校书,诗人才适逢盛会,得以参加宫廷宴饮,倍感荣幸,以至于有一种神仙般的升天之感。颔联以初次参与的新奇眼光描绘了杯盏交接、谈笑正欢的宫廷宴会景象。颈联“玉阶鸣溜水,清阁引归烟”对仗精工,遣词摹态有宫廷余味,呈现出灵动明丽的状态。尾联以“芸香墓”寓藏书阁,希望自己手自雠校的书可以历经万年,传之后世。

(二) 特殊的意象群

集贤学士本身就有较好的学术根柢,又得以编纂、修撰图书,大多具有学者和文士双重身份,其应制诗因此带有盛世学者的色彩,其中最突出的表现便是用典相类,语言张弛有度,文治意象

大量出现,而《初学记》等类书的编纂又丰富了他们的知识储备,使得用典以增强诗歌深度的技巧变得顺手拈来。

中国古诗因字数、韵律等要求,必须要用最简练的语句来表达最丰富的思想,而最符合这一要求的修辞方法就是隶事用典。典故因其本身所具有的某种象征性以及深厚的情感意味,往往会令读者产生悠远的遐想,受到艺术的感染。典故并不只是某事的代名词,它更是一个完整的情境,包括人物、景象、色彩、声音、气息以及相应的情感。它呈现在读者脑海中的不只是一个抽象的词语,而是一幅形象生动、身临其境的画卷。集贤学士的应制诗一改六朝以来的声色颂扬,而转向对帝王文治武功的颂美。在《奉和圣制送张说赴集贤院学士赐宴》大型组诗中,集中表达的主题是“广学崇儒”,因此,重学、尊贤、书府等意象便大量涌现。如:

侍帝金华讲,千龄道固稀。位将贤士设,书共学徒归。(张说)^{[3]150}

崇文德化洽,新殿集贤初。(徐坚)^{[2]1111}

西学垂玄览,东堂发圣谟。天光烛武殿,时宰集鸿都。(贺知章)^{[2]1146}

圣主崇文教,层霄降德音。尊贤泽既厚,式宴宠逾深。(陆坚)^{[2]1119}

学开丹殿籍,名与石渠贤。(赵冬曦)^{[2]1059}

台座征人杰,书坊应国华。(韦述)^{[2]1118}

东堂起集贤,贵得从神仙。(王翰)^{[2]1605}

尽管叙述的是同一件事,但学士们的侧重点并不一样。张说作为宰相及集贤院知院事,特别强调“贤士”的职责和意义。徐坚直言“崇文”“集贤”,“德化”一词既写实,又颂圣,完美地对应了玄宗诗中的“广学”“崇儒”。贺知章句句用经典,以“玄览”“圣谟”二词称颂玄宗的广学崇儒政策极富远见。其中,“玄览”语出《老子》:“涤除玄览,能无疵乎?”^{[4]108}“圣谟”语出《尚书·伊

训》:“圣谟洋洋,嘉言孔彰。”^{[5]306}二书均为当时士子必读的经书。贺知章和赵冬曦分别用“鸿都”“石渠”之典喻集贤院,既表明其为藏书之所,又突出了学士们的学问识见。王翰进一步突出贤士的地位,先声夺人地将集贤学士比作神仙,凸显出真实的个人感受。陆坚则用质朴的语言来颂圣,兼及“文教”“尊贤”两个方面。

集贤学士的应制诗平正通达,多写盛世之音,与失意文人或在野文人的诗风迥然不同。如果将这些作品分开来读,只会觉得满纸颂圣之声,却忽视了诗歌想要传达的主题,即广学崇儒。但是,当把这组诗结合起来阅读时,就可以发现它们之间彼此呼应,每一首都带有丰富的回想。彼时,集贤学士处于广学崇儒的时代风气下,真挚地歌颂这一合乎他们心声的文教政策,为这一时期国家的政治品格和文学风气带来积极的影响,反过来也促进了盛唐风貌在社会中的传扬。但是,随着玄宗的施政方针由崇儒重教向慕道用法的转变,到天宝年间,礼乐文治、崇儒重教的颂声几乎在集贤学士的应制诗中消失了。学士们为了迎合玄宗的志趣,不遗余力地在诗中表现道家 and 道教主题,《送贺秘监归会稽》组诗无疑是最直观的证明。如:

二疏方告老,四皓尽归山。……霓裳标逸气,丹灶理童颜。(韦述)^{[6]850}

霓裳因宠锡,鹤驾欲凌虚。……函关遇真隐,应演道家书。(陆善经)^{[6]830}

挂冠知止足,岂独汉疏贤?入道求真侣,辞恩访列仙。(李林甫)^{[2]1212}

晚岁朝真隐,皇情谅不违。……祖帐临青道,天章降紫薇。(齐光义)^{[6]844}

抗情遗黻冕,高步出氛埃。横海鸿飞远,登仙鹤语催。(韦斌)^{[6]849}

飞名紫府内,抗手白云乡。……夫君既鹤驾,幼子复霓裳。(于休烈)^{[6]881}

这些应制诗中,归隐和成仙是相辅相成的重要主题。其中,表征道教的“霓裳”“鹤驾”“仙鹤”“紫薇”“紫府”“列仙”“丹灶”等求仙意象在每首诗作中都出现了,而贺知章的归道又和归隐、

功成身退联系在一起,所有意象的营造都围绕这两个层面展开。于是,“四皓”“挂冠”“真隐”“遗黻冕”“出氛埃”等意象相应而出,也带入了诗人的感触。不过,该组应制诗的隐逸主题倾向于功成身退而非对仕宦的厌弃,这是特定场合下该有的创作基调。即使诗人们在其他诗作中流露出对仕宦的厌弃,这种失意的情绪也是不尽真切的,如果有诱人的仕进机会出现时,他们很少会做出放弃的选择。因此,整场送别中最重要的主题是入道,这是当时慕道风气的直接体现。学士们相互比拟,用类似的典故描绘场景,表达情感,专心致志地打造精巧的诗作。这些诗已没有初唐应制诗那种过分浓艳和华丽的修饰,辞藻的编排也显得张弛有度,典丽富艳之态已有所冲淡。

这组诗的主人公是贺知章,而贺知章的新身份正是道士,道教意象频繁出现自然在情理之中。但也不能忽视时代氛围,诚如钱锺书先生所言“一个艺术家总在某些社会条件下创作,也总在某种文艺风气里创作。这个风气影响到他对题材、体裁、风格的去取,给予他以机会,同时也限制了他的范围。”^{[7]1}自开元后期始,玄宗愈益尊崇道教,希求神仙,思慕长生,继而沉溺于此,这必然会影响到他的文学创作。此次送行,玄宗作诗云“遗荣期入道,辞老竟抽簪。岂不惜贤达?其如高尚心。环中得秘要,方外散幽襟。独有青门饯,群公怅别深。”^{[2]31}群臣在应制时必须揣摩皇帝的心意,不能离题太远。不独集贤学士,参与送行的群臣均以成仙、归隐和功成身退为主题展开诗作,尽力用出彩的语言表述同样的内容,表达类似的情感。但是,这次应制场面大,人数多,群臣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诗篇,难免不向旁人求助,读者在阅读这些作品时,总能找到相似的痕迹。

三、继承与新变

正如宇文所安先生所言“写作最出色的宫廷诗,需要技巧上的敏锐感觉、修饰的才能及对偶技巧的本能掌握。”^{[1]13}集贤学士亦符合这一特征。他们既是学者,又是富有才情的诗人,具

有宫廷诗人以复杂的修辞阐述主题的能力。不仅如此,体现在他们诗歌中的率意、朴素的风格和自由个性的表露,已开盛唐诗歌先声。就题材、体裁来看,集贤学士的应制诗似未超出前代宫廷诗的范围,但是,稍稍留意集贤学士的仕宦经历,便会发现风韵不同的两代人。

(一) 两代人的创作

老一代诗人如张说、徐坚、赵冬曦等,成长于初唐宫廷诗风的熏染之下,与前辈宫廷诗人过从甚多,对宫廷诗有难以割舍的继承和认同,而神龙、景龙以来的一系列政治事变和人生际遇,又使他们的应制诗在内容和表现手法上发生了变化。譬如张说的应制诗,景龙年间以游宴赏玩为主,多用富贵意象,显得有些板滞;开元复相以后,贬谪湘岳的经历使他对眼下崇儒尚文的风气倍加珍惜,并在宴集唱和中真挚地表露感情,倾吐愿望,主题向文教武功等方面转变,比以往的宫廷诗多了刚健之气和真情实感。在新的时代风气下,宫廷应制诗的一个突出主题是修文、崇儒、德化、集贤、弘扬礼乐等。在称扬武功方面,最出色的作品莫过于张说的《将赴朔方军应制》。诗云:

礼乐逢明主,韬铃用老臣。恭凭神武策,远御鬼方人。供帐荣恩饯,山川喜诏巡。天文日月丽,朝赋管弦新。幼志传三略,衰材谢六钧。胆由忠作伴,心固道为邻。汉保河南地,胡清塞北尘。连年大军后,不日小康辰。剑舞轻离别,歌酣忘苦辛。从来思博望,许国不谋身。^{[3]147-148}

该诗起笔端重苍莽,明人胡震亨云“凡排律起句极宜冠裳雄浑,不得作小家语。……张说‘礼乐逢明主,韬铃用老臣’……此类最为得体。”^{[9]99}叙述部分较为简洁,接下来的八句对仗精工,用意尤妙,其中,“胆由忠作伴,心固道为邻”最合应制之道。末四句收转至“将赴”主题,豪情恣肆,有边塞诗的韵味。全诗既符合应制诗温厚敬上之旨,又自有掀髯慷慨之气。清人李因培评此诗“骨气坚凝,气体雄厚,此工部先鞭也。”^①又

云“燕公五排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时于坚壁中作浑脱舞。后人竭力效之,终不可至。”^②又如“关山由义近,戈甲为恩轻。丝竹路傍散,风云马上生”(《奉和送王峻巡边应制》)^{[3]70},笔力雄肆,动人心旌,极富清拔神俊之气。“位窃和羹重,恩叨醉酒深。缓歌春兴曲,情竭为知音”(《恩制赐食于丽正书院宴赋得林字》)^{[3]188},颂圣与个人情感融为一体,意绪真挚动人。此外,贬谪山水的熏染使他的应制诗多了灵动之感,如“上阳柳色映春归,临渭桃花拂水飞”“渭桥南渡花如扑,麦陇青青断人目”(《奉和初入秦川路逢寒食应制》)^{[3]108}等,状景清新,境象开阔,冲淡了应制诗惯有的富贵气。

少一代如王翰、王湾、徐安贞等,多于开元年间入仕,他们自觉借鉴宫廷诗人在语言结构和营造诗境方面的技巧,也把自己的生命体验带入宫廷,尽管发言立意并不成熟,加之人微言轻,在当时的宫廷诗坛上没有多少影响力,但他们的创作理念和美学理想却通过文坛宗主的称引而流布开来,继而对当时的诗学趣味产生影响。

王翰豪健恃才,不拘礼法,其诗如《凉州词》等,纵笔快意,慷慨蕴藉,是盛唐边塞诗的绝唱。张说捕捉到这些诗中的盛唐风调,赞之“如琼杯玉斚”“炫然可观”^{[10]381},对王翰礼遇有加。张说复相后,“以瀚(翰)为秘书正字,擢拜通事舍人,迁驾部员外郎”^{[11]5039},还引他入集贤院修撰,王翰也因之得以参与开元前期的诗坛盛事。不过,王翰进入宫廷后所作的应制诗,尽管字句工整,造语讲究,但同他那些流传甚广的绝句相比,纵逸放旷的豪气已有所收敛,如《送张说集贤上学士赋得筵字》:

东堂起集贤,贵得从神仙。首命台阶老,将崇御府员。送人锵玉佩,中使拂琼筵。和乐熏风解,湛恩时雨连。长材成磊落,短翮强翩翾。徒仰蓬莱地,何阶不让缘。^{[2]1605}

① 李因培选评、凌应曾注《唐诗观澜集》,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刻本。

② 同上。

王翰标榜自我,“发言立意,自比王侯,顾指侪类”^{[11]5039},具有很强的文人个性。但是,应制诗特有的场合和要求使他不得不收敛个性,努力将诗歌写得文雅工整。和典型的宫廷诗相比,王翰的应制诗显得用典不足,诗味较薄,总有意气鼓滞之感。如起首便言“贵得从神仙”,将自己的生命体验直接带入,初入宫廷的兴奋之态表露无遗。可能觉得不够妥当,诗人刚一吐露心声后便马上收敛,继之以宴会场面和风景的描绘,并以“时雨”比“湛恩”,语义双关,归结到称颂主题。“长材”二句,清逸感伤之态又现,抒情之意甚明,结尾时也未能源束得住。尽管新一代学士的应制诗写作技巧还不够纯熟,但他们拒绝在各种规范准则中失掉个性,逐渐从模式化的情感角色中挣脱出来,为应制诗的写作带来了些许新意。

开元五年(717年),王湾被马怀素召入秘书省,参加四部书的整理,之后又被元行冲选入丽正院,与刘仲丘共治集部,其学术功底可见一斑。其实,王湾诗名早著,或因久困修书之业,不为天下所知。张说入主丽正书院后,王湾投赠《次北固山下》,其不同于初唐诗的崭新格调以及从海日生于残夜、新春入于旧年的自然景象中悟出的哲理令张说耳目一新,大为叹服,遂手书“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一联于政事堂,“每示能文,令为楷式”^{[12]257},一时传为佳话。张说捕捉到王湾诗中恢弘壮阔的风神气度,并以其权相身份推广了这种高朗、清丽、壮美的诗歌境界,对诗歌的走向有一定的引导作用和启示意义。王湾于先天元年(712)登进士第,早年所学诗、赋必然受到武后以来盛极一时的珠英、景龙学士的影响。入京之后,王湾在校书之余,自觉学习前辈宫廷诗人的写作技巧,应制诗已作得相当精致,如《丽正殿赐宴同勒天前烟年四韵应制》:

金殿忝陪贤,琼羞忽降天。鼎罗仙掖里,觴拜琐闼前。院逼青霄路,厨和紫禁烟。酒酣空忺舞,何以答昌年。^{[2]1170}

此诗多取“金殿”“琼羞”“仙掖”“青霄”“紫禁”等仙家意象,华藻整栗,对仗精工,不出初唐宫廷诗流丽华艳的范畴,但丽而不艳,自有清雅意味。

凡此种种,无不显示出地方诗人在借鉴宫廷诗法后,于清新中造精致,于意蕴中托深婉,在表现鲜明个性的同时,使诗歌体格进入了新境界。

(二) 律诗的发育

不一样的成长背景和生命体验使盛唐集贤学士的应制诗呈现出新的特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律诗的发育。集贤学士多以进士、制举入仕,这就要求他们既晓经义,又善文辞,如徐坚、贺知章、赵冬曦、韦述等是进士出身,孙季良、徐安贞、孙逖等则以制举登科,都是学问、才识拔尖之人。以进士科为例,自永隆二年(681年)起,进士考试定为经义、杂文、试策三场。其中,杂文有两篇,在开元、天宝年间大体上是一赋一诗,赋的定式通常为八字韵脚,诗的定式为五言六韵的排律,而五言排律雍容典雅,适于应制,正好是宫廷诗最流行的体裁。应试举子必然要学习、摹仿宫廷诗人的诗风,以增加中试的可能,这就强烈地诱发了他们对诗歌技巧的广泛兴趣。集贤学士登第入仕,尤其是进入宫廷后,为了在日常应景活动中应付自如,还需要继续学习和创作宫廷应制诗。其中,以张说为中心的集贤学士以及其他朝廷官员的应制唱和活动,进一步促进了律诗的普及和律体的成熟。

葛晓音先生在研究开元诗坛时发现“神龙至开元前期,五言律诗和五言排律成为诗坛的主要体裁,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到开元初,五排又更多于五律。”^{[13]332}这在集贤学士的群体创作中表现得极为明显。开元十一年送张说巡边时,学士们创作的应制诗均为五言二十句排律。开元十三年贺张说任集贤院知院事时,诸人所作应制诗绝大部分是五言十二句排律,仅有三首为五言律诗。作为京城文坛的中心,集贤学士集束式地创作五排,锻炼和提高他们在诗歌形式技巧方面的能力,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突出现象。至天宝三年送贺知章归会稽时,集贤学士的应制诗已全为五言律诗。就现存的37首《送贺秘监归会稽诗》来看,除7首为五言排律、2首为七言律诗外,其他均为五言律诗。这说明五律已大为普及,七律也已进入宫廷,并因律诗的发展

比较成熟而很快地成长起来。

集贤学士应制的五言排律已非常重视对仗,这不仅指辞藻方面的对偶,也表现为平仄相对,如张说的《春晚宴两相及礼官丽正学士侍宴应制探得开字》:

圣政惟稽古,宾门引上才。坊因购
书立,殿为集贤开。髦彦星辰下,仙章日
月迴。字如龙负出,韵是凤衔来。庭柳
余春驻,宫樱早夏催。喜承芸阁宴,幸捧
柏梁杯。^{[3]78}

全诗对偶,且平仄基本相应,符合对式律的规范,但大率失粘,只有首联符合粘合律。《诗源辩体》对此总结“初唐五言,古、律混淆,古诗既多杂用律体,而排律又多失粘,中或有散句不对者,此承六朝余弊,盖变而未定之体也。”^{[14]153}尽管说的是排律,实际上也关照了其他近体诗。这一现象,在同期其他学士的应制诗中也有表现,如赵冬曦《奉和圣制送张说上集贤学士赐宴赋得莲字》、韦述《奉和圣制送张说上集贤学士赐宴赋得华字》、徐安贞《书殿赐宴应制》等诗。这种对应制诗结构、用语的学习,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律诗的发育,促成了诗国高潮的到来。

综之,开元十三年前后,集贤学士的文学活动非常频繁,宫廷应制唱和蔚然成风。这些诗

歌,从题材来看,以宴会和送行为主;从体裁来看,以五言排律为主;主题上,向礼乐文治、帝王威严、功业德行等转变,格调也渐趋高昂。学士中风韵不同的两代人的创作,既给宫廷诗带来刚健之气,又为诗坛吹入清新之风,他们在诗歌语言塑造和营造诗境方面的努力,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律诗的发育。

参考文献:

- [1]宇文所安.初唐诗[M].贾晋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4.
- [2]彭定求.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3]张说.张说集校注[M].熊飞,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
- [4]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5]孔安国.尚书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6]全唐诗补编[M].陈尚君,辑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
- [7]钱锺书.七缀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8]宇文所安.盛唐诗[M].贾晋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14.
- [9]胡震亨.唐音癸签[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10]孙逢吉.职官分纪[M].北京:中华书局,1988.
- [11]刘煦.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2]傅璇琮,陈尚君,徐俊.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14.
- [13]葛晓音.论开元诗坛[M]//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14]许学夷.诗源辩体[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Study of Under-Ordered Poetry of Jixian Scholars in the Prosperous Tang Dynasty

LI Yunhua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Abstract: In the middle of the Kaiyuan period of the Tang dynasty, Confucianism and literature were highly esteemed. It follows that the Jixian scholars typified by Zhang Yue enjoyed a high status, hence the high frequency of the under-ordered poems. The poetry employed the “three-part” structure of the imperial poems in the initial Tang dynasty, but there appeared many original imag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oetic mood, with a wide range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achievements, and supernatural beings in Taoism. This is the trend of the times in the literary projection, which, in turn, promotes the style of the prosperous Tang dynasty in the social publicity. The two generations of scholars with different charms sought for innovation while inheriting in their writings, which not only brings a vigorous feature and freshness trait to the under-ordered poems, but also somewhat boosts the formation of regulated verses.

Key words: Jixian scholar; under-ordered poem; “three-part” structure; innovation

(责任编辑 吴艳玲)